

高交会上“消失”的“智慧党建”：习近平时代的党内数字化治理

作者：赤安超（ChiAnchao）

2023年第二十五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简称“高交会”）于11月15日至19日在深圳会展中心举行。

据官媒报道，本届高交会吸引了105个国家和地区团组、4000多家展商参与，展会总面积达50万平方米。累计入场人数为24.8万人次，累计洽商交易金额达372.79亿元。在会期内，举办了132场重大活动，发布了681项新产品和新成果，吸引了5家研究院落地深圳，17个中央—地方合作项目现场签约¹。

然而，与往届不同的是，本届高交会的盛况发生在当前中国经济低迷的背景下。

随着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主要贸易伙伴需应对不断上涨的生活成本，中国的出口一直保持疲软态势。从5月份开始，出口下降成为全年的持续趋势²。其次，中国的内需一直相对羸弱，私营部门的投资意愿低迷。过去三年新冠肺炎（COVID-19）大流行进一步加重了中国消费者的负担。截至2023年6月，中国城镇16岁至24岁青年失业率创下历史新高，达到21.3%³。面对青年失业率可能进一步上升，中国政府于2023年8月暂停发布这一信息⁴。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原本预期中大流行后的消费热潮并未真正出现。

长期以来，房地产市场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占据了整体经济活动近四分之一的份额，并且，与之相关的家庭财富占中国总家庭财富的70%。然而，该行业目前正经历重创⁵。政府对开发商借贷的打压使得这一情况进一步恶化。知名开发商如碧桂园等尤其受到严重影响，引发了各界对该行业整体健康状况的担忧。

中国一直面临着严峻的废弃建筑项目问题，特别是在房地产领域。信贷驱动的建筑热潮加剧了这一问题，由于开发商资金枯竭或陷入财务困境，导致全国范围内出现了大量空置房屋和未完工的建筑项目。这些未完工的项目通常被戏称为“烂尾楼”。中国第二大开发商恒大集团便是其中备受关注的案例⁶。“烂尾楼”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一大忧虑。根据野村证券的一份报告，中国约有2000万套未开工和延迟预售的房屋，预计需要3.2万亿元人民

¹People's Daily. (2023, November 21). Closure of the 25th China Hi-Tech Fair [第二十五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闭幕].

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23-11/21/nw.D110000renmrb_20231121_6-04.htm

²Cheng, E. (2023, November 7). China's imports surprise with growth in October, but exports fall more than expected. CNBC.

<https://www.cnbc.com/2023/11/07/china-trade-exports-imports-data-for-october-2023.html>

³Steil, B., & Harding, E. (2023). The Root of China's Growing Youth Unemployment Crisis.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https://www.cfr.org/blog/qe-and-inflation-ft-responds-us-and-we-them>

⁴Fu, C. (2023). China Suspends Report on Youth Unemployment, Which Was at a Record High. The New York Times. <https://www.nytimes.com/2023/08/15/business/china-youth-unemployment.html>

⁵Gao, L., & Woo, R. (2023, October 18). China's falling property sales, investment weigh on recovery. Reuters.

<https://www.reuters.com/world/china/chinas-falling-property-sales-investment-weigh-recovery-2023-10-18/>

⁶根据多家中国媒体的估算，恒大留下的“烂尾楼”数量达到162万套，牵涉到600万名业主。详见：BBC (2023) 恒大危机：许家印涉罪被查 上百万套“烂尾楼”怎么办？

<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chinese-news-66960231>

币（4400 亿美元）才能完成⁷。这一局面可能进一步演变成为社会问题，对社会稳定构成威胁。

科技行业近年来也出现了类似于房地产领域“烂尾”项目的现象，尤其在半导体产业更为显著。鉴于中国政府积极推动半导体产业的发展，以减少对外界的依赖，这激发了人们对该领域的投资热情。然而，由于资金冻结和管理不善等原因，一些项目最年来陷入停滞。根据一份 2020 年的报道，仅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就有 6 个百亿级别的半导体项目在江苏、四川、湖北、贵州、陕西等 5 个省份停摆⁸。

本届高交会，笔者主要关注推广“智慧党建”相关产品及服务的参展公司。近年来，中国共产党积极推进“智慧党建”项目，期望将信息科技融入党的内部治理。该项目主要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致力于促进党建工作的信息化和智能化，项目内容涵盖党内政治教育、党员管理培训、党务管理等多个方面。

通过这些数字化解决方案，党中央期望在党支部活动、党组织关系转接、党费收缴等方面实现更高效的管理，以提高党建工作的整体效率。这一系列创新性的数字工具被期待为党内管理注入新活力，推动党建工作朝着更加智能、便捷的方向迈进。

在本届高交会开始之前，官方便设立了专门网站以宣传“智慧党建”展览。然而，当笔者走访了各个会场后，并未发现任何一家参展公司展出“智慧党建”相关产品及服务。此后，笔者积极尝试通过网站上提供的负责人联系方式进行沟通，但遗憾的是未能收到任何回应。在搜索了本届高交会官网的参展公司后，笔者发现一家名为捷径科技集团将在大连馆展出其公司旗下的智慧党建系统，然而，当笔者亲自走访了大连馆后并未发现这家公司。

本文将从不同历史时期中共领导人对科技发展的态度入手，展现最高领导层一直以来对科技的矛盾态度。随后，文章将聚焦“智慧党建”的政策目标，解读其在党内数字治理、信息化建设等方面的战略意图。接着，将讨论“智慧党建”在实际应用中的具体情况，包括相关产品和平台的发展，以及其在党组织内部的推广和应用情况。

最后，文章试图对“智慧党建”可能的发展走向提出一种猜想，并对其进行分析：“智慧党建”也许会沿着一种“开始时声势浩大，但最终将以平淡结束”的轨迹发展。本文将结合历史经验、政策导向以及技术发展的现状，解释这一猜想可能的成因。文章旨在为理解中国政治体制下科技与治理的关系提供一种洞察。

对科技的矛盾态度

⁷Cheng, E. (2023). China's unfinished property projects are 20 times the size of Country Garden. CNBC. Retrieved from <https://www.cnbc.com/2023/11/15/chinas-unfinished-property-projects-are-20-times-the-size-of-country-garden.html>

⁸新浪财经 (2020). 六个百亿级项目坍塌 “中国芯”遭遇烂尾潮 <https://finance.sina.cn/chanjing/gdxw/2020-09-30/detail-iihvvpwy9799323.d.html?from=wap>

中共对科技的态度呈现出一种矛盾：一方面，科学技术被视为国家治理的有力工具，为实现国家治理目标提供支持；另一方面，中共对科技的态度也流露出对其潜在的动摇政权能力的担忧。这种矛盾态度在不同历史时期表现出不同的特征与强度，呈现出“非线性”的发展趋势。总体而言，中共对科技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最高领导层的具体立场。

毛泽东时代，科学技术被看作是国家实力的象征，尤其是提振军事力量的重要手段。1949年国家成立后，中国按照苏联的发展路线重新组织了科学机构，佐以更官僚化的模式，使得科学领导权主要由非科学家掌握。他们根据中央确定的计划分配研究任务，并通过行政手段来控制人才招聘和内部人员流动⁹。

文革时期，党和科学家群体之间的关系极度紧张。政府引导科技促进经济发展和产生军事回报的努力屡遭挫折。官僚与科学家之间存在严重利益分歧，导致对科学家和知识分子的迫害事件屡屡发生。当时的中共试图建立一种新的科学发展体系，通过鼓励群众参与，而非专业的科学探索和研究，集中解决农业和工业中的现实问题，以消除科学家和工人之间的差异。实际上，当时的科学研究更多地被视为一种政治活动。

邓小平时代的开始标志着与毛泽东时代的显著不同。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共将技术视为实现现代化和繁荣的关键动力。最高领导层把科技进步当作解决中国社会和政治挑战的重要手段，并努力将科学家和技术专家的利益与国家利益相结合。邓呼吁科学家和其他技术专家回归党和国家，并许诺他们更多的职业自由和更高的社会地位¹⁰，并提倡建立一个支持专业知识的技术官僚系统，将中共的合法性寄托于经济发展和“科学客观性”，而非毛时代的意识形态。邓还认识到参与国际间科技发展的重要性，这一观点推动了中国政策从排斥和孤立转向积极参与和促进与美国的科技交流与合作¹¹。

然而，由于缺乏根本的结构性变革，维护党和国家在技术发展中的核心作用与允许个体机构和私营企业创新之间的紧张关系并未被消弭。这种紧张关系反映了在政治层面维持一党社会主义专政与在经济层面走向市场体系之间存在更广泛的冲突¹²。权力制约机制的缺失和腐败问题成为有效实施科技政策的主要障碍之一¹³。此外，过度强调科学技术是解决中国所有社会弊病和政治困境的灵丹妙药，可被视为科学主义的一种形式，过度简化了社会、政治和经济因素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导致过分强调技术解决方案，而忽视解决根本的社会和政治问题。

习近平执政时期，科学技术被视为实现中国民族复兴和社会进步的关键因素。习近平倡导并

⁹Photius. (n. d.). China Soviet Influence in the 1950s [中国苏联在 20 世纪 50 年代的影响]. Retrieved from

https://photius.com/countries/china/economy/china_economy_soviet_influence_in_~946.html Library of Congress Country Studies; CIA World Factbook. (n. d.).

¹⁰DigiChina (2020). Experts: Xi' 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peech Echoes and Updates Deng Xiaoping. Retrieved from

<https://digichina.stanford.edu/work/experts-xis-science-and-technology-speech-echoes-and-updates-deng-xiaoping/>

¹¹Xiong, C. (2021). Deng Xiaoping' s Views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rigins of the Sino-U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operation, 1977 - 1979. *Journal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28 (2), 159-185.

¹²New York Times. (n. d.).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Party-State." Retrieved from <https://archive.nytimes.com/www.nytimes.com/ref/college/coll-china-politics-002.html>

¹³Kobayashi, S., Baobo, J., & Sano, J. The " Three Reforms" in China: Progress and Outlook Sakura Institute off Research, Inc.

推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将科技视为促进经济增长、政治控制以及社会稳定的重要工具。并且，当局并不对所有的科技类型提供一视同仁的支持。这种支持是有选择性的。例如，在领导层看来，数字平台经济为消费者提供了便利，但并不对国家的未来经济产生贡献，而科技发展应与像半导体这样的“硬”技术相联系¹⁴。

在经济方面，越来越多的担忧认为数字平台公司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带来了不利影响。它们在牺牲其他公司利益的同时积累了垄断权力，并在一个以“平等”为傲的国家中被视为过于富有。在政治层面，科技发展被认为必须用以加强党和国家的权力。然而，数字平台经济的庞大规模及其私有属性被视为对中共领导层的威胁。因此，必须通过行政力量加以管制和约束¹⁵。

而领导层将那些用于提高经济效率和军事能力的军民融合技术放置在了更优先的位置，并致力于打破中国民用和军用科技领域之间的壁垒。这一举措的目的在于将技术投资更迅速而有效地转化为军事应用，进而将其整合到生产流程中，以推动经济扩张，和实现更大范围的科技自力更生。

在国内，政府通过全面推进数字监控，有意构建一个广泛的视听全知体系。这一体系不仅监测重要公共场所，更期待其效能能够深入个体私人生活。与此同时，数字技术被不断融入公共与行政管理，以提高城市规划的效率与精准度，推动区域智能化。在国际舞台上，尽管强调中国参与全球科学技术的重要性与邓小平时代相似，但习近平时代的科技发展必须融入一种更强劲的民族主义叙事，旨在将中国塑造为高科技产业的国际领导者。

党内数字化治理：“智慧党建”

值得注意的是，采用创新数字技术以提升治理能力，不仅服务于更广泛的中国社会，同时也在官僚系统中发挥作用，特别是在党的内部管理方面。由此，形成了“智慧党建”的新兴趋势。

中国共产党的党的建设，又称“党建”，是中共为履行其使命而进行的意识形态和组织结构调整。该过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和民主集中制概念为核心。理论上，中共将自己视为“先锋党”，由社会上思想最先进、行动最忠诚的成员组成，负有领导无产阶级（工人阶级）反对资本主义斗争的使命。民主集中制是中共采用的组织原则，其中，政策决策是在中央层面进行的，并对党的所有成员具有约束力。该原则要求一旦决策形成，就要在行动上实现高度统一。

在意识形态方面，中共将其理念的塑造定义为一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通过对党员的深入教育，致力于建立党中央与党员之间的密切联系，加强社会与党中央的纽带，同时在党内外抑制竞争性叙事。

组织结构上，中共的党建工作延伸至社会的各个层面，从省市到社区，甚至涵盖物业管理机构。这些层级的党支部负责执行党的原则和政策，确保遵守国家法律法规。自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共展现了应对中国经济快速崛起所带来的发展压力的能力，特别是在私营部门扩

¹⁴Collier, A. (2022). *China's Technology War: Why Beijing Took Down its Tech Giants*. Springer Nature.

¹⁵详情可参考《对中国大型科技公司的整治：完整时间线》：The China Project. (n.d.). *China's Regulatory Actions Against Big Tech: A Comprehensive Timeline*. Retrieved from <https://thechinaproject.com/big-tech-crackdown-timeline/>

展了其组织基础¹⁶。例如，自 2012 年以来，中共一直在加强私营企业中党的影响力。所有拥有三名以上中共党员的企业必须成立党支部。这一过程包括将党员整合到公司管理和决策过程中，由此改变了对企业自治的传统理解¹⁷。

中共党建的主要目标是维护其在中国的合法性和控制权。近年来，在习近平领导下，中共一直致力于在党内和全国范围内重新塑造更为坚定的意识形态信仰，作为其“全面从严治党”方针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治理模式的目标是在党内强化一种秩序，确保规章制度得到遵守并严格执行，对一切违规行为进行彻底调查。

并且，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党的建设开始尝试运用互联网技术和信息化手段开展工作。“智慧党建”是指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手段，对中共的党建工作进行创新和优化。习近平在党建工作会议上强调：“要紧扣机关党建时代特点和党员思想行为特征开展工作，积极探索有利于破解难题的新途径新办法，积极探索信息化条件下开展工作的新载体新路数¹⁸。”这种“数字化”的党建可以被视为中共对党的治理进行创新性探索的一部分，而信息技术应用则成为这类探索的核心。

从当前官方的探讨及实践来看，“智慧党建”项目着重推动党建工作的四个关键方向。其中，首要方向之一在于建立系统化的党员管理体系。第一，这包括对党务信息的精准记录。从提交入党申请书到正式成为党员的全过程都会被系统详细记录，以确保每一个关键步骤都包含准确可查的数据。

其次，是为促进更整合的党组织关系管理。例如，在传统模式下，党员从一个组织转到另一个组织时，需要由原党组织开具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党员本人携带介绍信到新组织报到，新组织接收介绍信并出具回执。而数字化党建的模式则希望实现党组织关系的在线共享，使得党员的组织关系转接可在线上办理。

再来，旨在加强对流动党员和流动党组织的管理。对于一个拥有超过 9600 万成员的党组织而言，如何有效地管理外出流动党员和流动党支部是一个重要问题。有分析指出，许多党员外出务工、就业，甚至常年定居外地，这部分外出流动党员与党组织的联系相对较弱。在主动向党组织报告思想并积极参与党组织活动的自觉性较低的情况下，党性觉悟可能逐渐减弱¹⁹。然而，通过系统化的改革，有望实现党员与党组织之间的实时联系，流动党员可以通过在线平台参与组织生活和进行理论学习。

由此，为每一位党员打造“数字档案”似乎是党员管理系统化中的关键要素。“档案治国”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被视为治理社会的有力工具，以确保对人口的管控²⁰。传统意义上

¹⁶Maizland, L., & Albert, E. (2022).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https://www.cfr.org/background/chinese-communist-party>

¹⁷Livingston, S. (2021). The New Challenge of Communist Corporate Governance.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https://www.csis.org/analysis/new-challenge-communist-corporate-governance>

¹⁸ Lin, Z. (2021). Leveraging Big Data to Promote Party Building in the New Era. Qiushi Journal [以大数据助推新时代党建工作] http://www.qstheory.cn/dukan/hqwg/2021-05/11/c_1127430609.htm

¹⁹Wang, Y., & Liu, B. (Eds.). (2023). “Building Modern Party Building in the New Era: Party Building with Standardization, Digitization, and Intelligentization.” [打造新时代现代化党建——党建“标准化+数字化+智能化”] Central Party School Press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²⁰Shaw, V. N. (1996). Social control in China: A study of Chinese work units. Greenwood Publishing

的“档案”是一种永久性文件，详细记录了个体从出生到生命终结的政治倾向、所有职业成就及日常行为。任何在思想、行为或活动方面的偏差都会被详实记录。这些不良记录甚至会成为持续存在的污名，对个体的职业发展、所享受的福利待遇产生不良影响。而数字化后的档案更强调其智能性，具有长期保留、随时调取和防篡改的特点，进一步强化了其作为持续性管控工具的存在。

由此联系到“智慧党建”的第二个着力点，即利用数字工具进一步加强党内监督。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强调了对党员的纪律要求，要求党员干部开展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做到“身正为范”²¹，并开展内部全面整顿运动，旨在解决党内于思想、行为和组织方面的缺陷。

党内监督智能化后，上级党组织希望通过有效的数字工具随时抽查、调阅党建信息，并对各支部党建工作情况进行实时全程动态了解，以避免党建工作虚化敷衍、流于形式。这些数字工具被期待为上级督查和指导提了依据，能够及时指出和纠正制度落实不到位的情况，对各级党组织形成震慑²²。利用监控、定期考评等方式，让不达标的党建活动、党组织“无处逃匿”，同时也可以在不同行业，区域中树立良好开展党建活动的范本，在更广阔的范围内推行，以形成良性互动的格局。

并且，以上数字监督还将与更常态化的党员教育结合，作为“智慧党建”第三个重点关注的方面。通过信息系统将党支部的“三会一课”、“组织生活会”等教育活动全面纳入信息化管理平台²³。以中宣部的“学习强国”平台为例：普通党员打开手机就能收看中央党校的课程，实现“在家上党校”；平台可涵盖的内容包括党章党规、领导人重要讲话、中央文件和党刊党报，以及相关的视频、音乐、电视转播和新闻广播等，实现一种党的远程化意识形态传播。

最终，“智慧党建”致力于促进更便捷化的规划与决策。通过大数据分析系统对党建工作进行系统规划，以降低党务工作者的负担，限制人为因素的主观作用，使大数据分析结果指导党建工作，及时评估各个环节、各个领域的工作效能，并对问题进行实时预警。通过统一标准、整合资源、优化业务流程以及共享网络服务，实现党建工作信息化性能的提升、信息更加集成、业务更加协同。

“智慧党建”足够“智慧”吗？

从“智慧党建”的政策目标来看，习时代党的治理在数字领域沿着两条不同但同时着力的轨迹运作。首先，它包含了对官僚体系的专业水平提升的期待，展现了对更为精致的基础设施权力的强烈追求。其次，它表现为更加严苛的内部监督，并对专断手段有更为明显的倾向。这两个双重目标共存于中共对数字时代党建的愿景中。

Group.

²¹Xinhua Net. (2016, December 21). Harnessing the Sharp Weapons of Criticism and Self-Criticism [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锐利武器].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12/21/c_1120156484.htm

²²Wang, Y., & Liu, B. (Eds.). (2023). "Building Modern Party Building in the New Era: Party Building with Standardization, Digitization, and Intelligentization." [打造新时代现代化党建——党建“标准化+数字化+智能化”] Central Party School Press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²³注：“三会一课”是中共基层党组织的重要制度，包括定期召开支部党员大会、支部委员会、党小组会，以及按时上好党课。这一制度旨在加强党内政治生活，提高党员的思想觉悟和基本素质，完成党的各项任务；“组织生活会”是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是交流思想、总结经验教训、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等。组织生活会一般以党支部党员大会、党支部委员会会议或者党小组会形式召开。通过开展组织生活会，党能够及时发现和纠正自身存在的问题，从而保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随着市场竞争逐渐加剧,各类组织均需应对不断增长的运营压力。在围绕智慧党建的讨论中,官方经常强调激烈的市场竞争给党带来的挑战。为了迎接这些挑战,党似乎被迫以企业的方式审视自身状况,需要与其他组织展开竞争。因此,在这一背景下,仅仅依靠行政强制力是不够的,中共同样需要确保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具有足够的吸引力,使其数字化解决方案能够更加有效参与到下级官僚系统的日常实践中。

“监视资本主义”阐释了大型科技公司,通过广泛渗透个体数字平台来深入介入私人生活,随后获取、分析和利用个人数据的牟利方式²⁴。在数字化时代,数据已成为许多企业追求经济优势的宝贵资源。这些企业通过提供更具吸引力的产品及服务以抢占公众注意力,从而获取更多用户数据。在中共的官方论述中,党承认与“监视资本家”在获取个体数据、抢占公众注意力的竞争关系,尽管双方存在明显的权力不对等,并且更倾向于党的一方。

正如本文之前所提及的,党极有可能采取监管措施以回应来自科技企业的竞争,例如以维护国家安全的名义,禁止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在办公过程中使用市面上流行的数字平台,如微信和钉钉²⁵。官方论述强调了专门为“智慧党建”而创建的数字应用的重要性,而不是依赖市场上现有的商业数字工具,以实现党建的数字化转型。

需要强调的是,随着传统治理方式的有效性逐渐减弱,党在一定程度上必须接受一种新型的算法化治理方式。算法的重要性以及数字平台在数据收集、存储和分析方面的运用不可低估。这些工具为了解党员的偏好、行为和兴趣提供了信息丰富的见解,使党能够获悉他们的个性化需求,影响他们的选择和行为,并最终推进党自身的利益。

近年来,根据官方宣传,“智慧党建”在实际应用中似乎取得了显著的进展,将数字化解决方案整合到党建工作中被各级党委视为组织日常运作和沟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与此同时,当局为推动“智慧党建”相关议程也进行了实质性的投资,具体项目包括党建 App、党建微信公众号、可视化党建管理平台、3D 党建虚拟展馆以及“5G+VR”沉浸式党建体验等。报告显示,近年来针对这类产品的采购活动显著增加,2021 年上半年官方采购较前一年同期增长近 45%,项目的总投资额达到 1.5 万亿元人民币(2300 亿美元)²⁶。

然而,正如本届高交会上消失的“智慧党建”相关公司和展位一样,除学习强国外,目前市场上几乎找不到任何成熟可供参考的“智慧党建”产品。大部分推广“智慧党建”产品和服务的公司只提供描述性的产品介绍。如果仅根据这些产品信息,很难了解例如关于长期数据保留和防篡改的具体措施。这引发了对数据在较长时期内的保证完整性和安全性的担忧。其次,提供的信息中明显缺乏关于数据化建模过程的描述。缺乏这些细节将阻碍理解原始数据如何转化为可行的见解和决策,以真正智能化党的内部治理。

并且,目前依然不清楚大部分“智慧党建”应用采用了什么样的数据整合策略。缺乏有关标准化党建实践、整合来自不同数字系统的数据,以及与外部机构建立数据库连接和共享的信息,

²⁴Zuboff, S. (2019). *The Age of Surveillance Capitalism: The Fight for a Human Future at the New Frontier of Power*.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²⁵相关报道请参考:《提醒!多名公务员因微信办公泄密被处分!》

<http://heb.hebei.com.cn/system/2021/03/10/100619123.shtml>;《机关、单位可以使用“钉钉”办公吗?》

<http://www.12371.cn/2019/08/26/ART11566776041541618.shtml>

²⁶CAICT. (2022). 2021 New Smart City Industry Map Research Report [2021 年新型智慧城市产业图谱研究报告]. Retrieved from <http://www.100ec.cn/index.php/detail--6611536.html>

因而这些数字解决方案的整体操作性和可用性依旧是存疑的。基于目前可得的信息，很明显“智慧党建”应用的开发和实施仍处于较为初级的阶段，并存在高程度碎片化的问题。

此外，在这些“智慧党建”产品的功能描述中尚未发现显著的技术突破。它们提供的功能在很大程度上与市场上现有流行的数字工具相似（例如，许多在线学习平台、微信或钉钉等，这些工具通常用于远程教育、企业通信和协作）。甚至可以说，这些产品所带来的使用体验相对更差。

在一位北京政府官员的日记中提到，使用这类党建平台的经历并不令人愉快²⁷。在支部办公室工作的党员被迫通过这些平台接受意识形态教育课程，其中包括强制参与时长为 3-6 小时，甚至 10 小时的冗长讲座视频。大部分党支部工作的党员需要完成 80 小时的学习，而更高级别的党员则被期望投入更多的时间进行课程学习。此外，该平台还会监控党员参与讲座的进度并评估他们的专注度。

因此，目前尚缺乏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引入这些专门的党建智能应用能够显著提升党员的数字能力以及处理日常工作的效率。要证明它们相对于现有数字应用的优越性，需要进行更多的实证研究，以确认这些应用的附加价值和实际效能。

开始声势浩大，结果却收效甚微

这里提出一种猜想，即党内数字化治理和其他“运动式项目”一样，开始时声势浩大，但最终可能以平淡结束。这种以运动模式开展的治理往往在形式上大张旗鼓，但取得的成果甚微，最初在全国范围进行广泛动员后迅速而仓促地结束。中共的意识形态强调通过全国动员来实现宏伟的愿景。然而，由于任务的复杂性以及管理一个如此庞大而多样的国家所面临的挑战，结果常常难以达到预期。

这种模式也受到过去历史经验的影响。例如，1958 年至 1962 年的大跃进运动旨在将中国从一个农业经济转变为一个工业化社会。然而，由于不切实际的任务指标及管理不善，该运动导致了经济灾难和饥荒。只是，这一时期的教训似乎并未持续改变中共的治理风格，产生对过度雄心勃勃和计划不周的举措的潜在后果的警惕。

伊扎·约丁提出的“表演型国家”理论认为，国家可以通过表演和伪装——善治的语言、符号和姿态——来塑造公众认知并化解危机²⁸。这一概念在中国的背景下尤其重要，因为在中国，国家常常难以满足公民的需求，但又面临强大的公众压力。对于许多科技项目来说，这种表演性国家理论可以提供一个有用的镜头来理解为什么其中一些智慧党建应用可能只是“虚有其表”，最终将被被放弃或无法充分发挥其潜力。

对于党的内部治理的智能化，中共启动了大型运动式项目来展示其技术实力。只是这些项目往往因为官僚系统既有的阻碍，技术限制和市场接受度等实际挑战，难以有可观的实际成果。然而，官方继续推动这些项目，作为其对技术创新和现代化承诺的一部分，再次体现了“表演型国家治理”的特点。

²⁷ Long, L. (2022, October 20). Xi Jinping Studies. London Review of Books, 44(20).

<https://www.lrb.co.uk/the-paper/v44/n20/long-ling/diary>

²⁸Ding, I. The Performative State. In The Performative State.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这种理论表明，当局利用这些项目作为一种表演形式，以营造良好治理和技术实力的印象，即使实际结果可能未达到既定目标。即使面临挑战和挫折，这也有助于维持公众支持和合法性。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当国家表现与实际结果之间的差距过大时，这种表演也可能无法给受众留下深刻印象。甚至导致公众的不满和批评，损害国家的合法性。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一些科技项目最终只是“雷声大、雨点小”，因为国家可能被迫决定减少损失，并将其表演转移到其他能够更令人信服地展示其治理能力的领域。

有研究表明，一些地方电子政府项目最终走向失败是因为这些项目主要被官员视为获取政治利益的象征性工具，而非为了真正改善政府绩效。

在《Technology Symbolization: Political Mechanism of Local E-Government Adoption and Implementation》一文中²⁹，作者提出了一个分析政府采纳及实施电子政务项目的框架，包括三个方面：环境（政治制度）、过程（对信息技术的认知、权力关系和战略互动）以及绩效。作者认为，政治环境塑造了人们对信息技术的认知，并为利益相关者提供了动机或造成了制约。之后，利益相关者会根据他们在权力结构中的位置来选择不同的策略和行动，最终影响项目的绩效。

假设政府决定实施一个旨在改善公共服务交付的电子政务项目。政治环境，包括政府对透明度、效率和公民参与的承诺，将塑造公众对项目的看法。如果政府以高透明度和利用技术造福公众而为人知晓，公民可能会积极看待这类电子政务项目。在这种情境中，利益相关者可能包括政府机构、技术提供商及公民。

每个利益相关者的行动和策略将受其在权力结构中的位置所影响。例如，一个拥有重要权力和资源控制的政府机构可能决定大力投资项目，确保必要的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源就位。技术提供商根据其影响力和能力的不同，可能选择创新并提供最尖端解决方案，使相关服务更加高效及用户友好。另一方面，公民可能选择积极参与电子政府平台，提供反馈，甚至主动在其社区内推广。

这些利益相关者的选择和行动，受其在权力结构中的位置和他们对项目的认知（受政治环境影响）的影响，最终将决定项目的绩效。如果所有利益相关者协同工作，电子政府项目有望取得成功，公共服务交付将得到改善，透明度及公民参与程度也会相应提高。

然而，在中国江门的案例中，由于项目的推动往往受到政治动机的驱使，官员追求表面政绩和面子工程的塑造，将电子政务项目作为展示某种现代化和创新进步的手段。于是，这种政务系统变成了一个象征性工具，对改善政府绩效几乎没有起到任何作用。这种现象被称为“技术符号化”。

它反映了电子政务项目在实践中可能被误用为政治象征，而非真正解决政府运作和服务效能的问题。项目在初期可能受到高度关注，但由于缺乏深层次的执行计划和可持续性战略，最

²⁹Tan, H., Zhao, X., & Zhang, N. (2022). Technology symbolization: Political mechanism of local e-government adoption and implementation.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dministrative Sciences*, 88(2), 511-532.

终可能无法实现预期的绩效提升。这种情况不仅令公众对政府的期望落空，也可能对政府的数字化转型产生负面影响。

高交会后记

大多数参与的民众似乎更关注事件的外延而非内核。他们走入这场“科技盛宴”，不是为了了解技术的奥秘，而更多是为了记录自己在这个数字时代的瞬间。拿着手机或相机，急不可待地拍下与科技产品合影的瞬间，仿佛这样的留影成了一种时髦的“打卡”仪式。而现场抽奖则成了另一项吸引人们的亮点，奖品的引诱似乎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展品和企业本身的魅力。

其次，引人注目的展位主要聚焦在与机器人互动以及一些容易理解的电子产品上。机器人的展区成了人潮汹涌之地，人们纷纷围绕着这些机械伙伴，试图体验与之互动的乐趣。与此同时，一些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产品，如耳机、按摩仪等，也成了人们喜闻乐见的焦点。这似乎表明，即便身处某种科技高峰，人们对于生活中实用而简单的产品仍有着不减的兴趣。

最后，我和朋友在离开高交会时偶然听到一段母女对话。女儿坦然地告诉母亲，她带她来这更像是参加一场社交活动。在她的描述中，整个深圳几乎都涌向了这些场馆，不为别的，只为在这里留下一段数字化时代的见证。